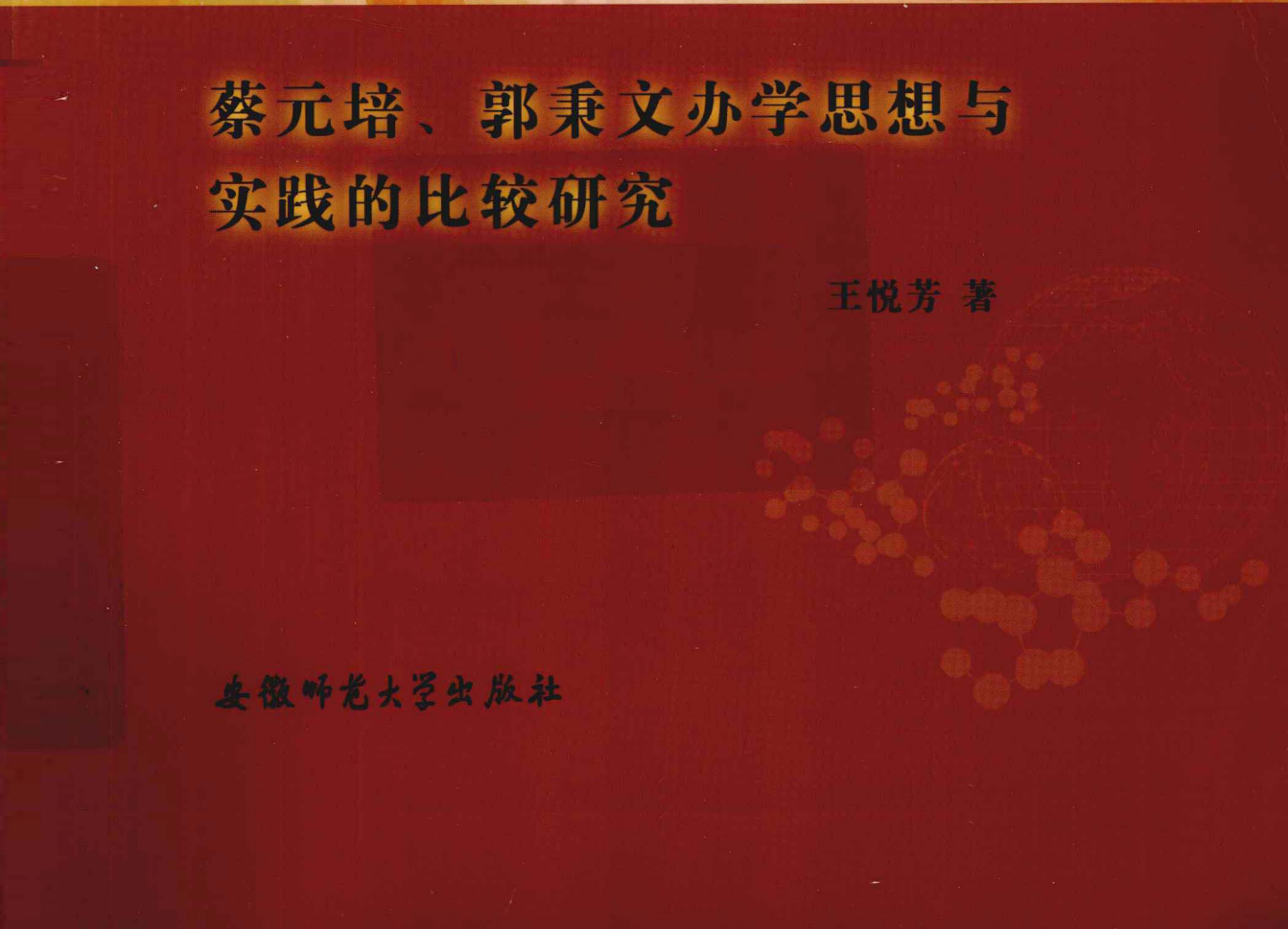




CAI YUANPEI GUO BINGWEN BANXUE
SIXIANG YU SHIJIAN DE BIJIAO YANJIU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 实践的比较研究

王悦芳 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国家一般课题

“中国著名大学校长办学之道研究”(BIA090045)的系列成果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 实践的比较研究

CAI YUANPEI GUO BINGWEN BANXUE
SIXIANG YU SHIJIAN DE BIJIAO YANJIU

王悦芳◎著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王悦芳著. —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2

ISBN 978 - 7 - 5676 - 0033 - 1

I. ①蔡… II. ①王… III. ①蔡元培 (1867 ~ 1940) —高等教育—教育思想—研究 ②郭秉文 (1860 ~ 1969) —高等教育—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649. 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0409 号

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比较研究

王悦芳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 3883578 5910327 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87 × 1092 1/16

印 张：14.25

字 数：401 千

书 号：ISBN 978 - 7 - 5676 - 0033 - 1

定 价：29.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摘 要

民国初期，有两位最为耀眼的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他们一南一北，共同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成就了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辉煌。本研究在对他们的一手资料作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按办学的逻辑顺序，对两人的办学思想与实践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比较，一方面使人们对两人的办学思想与实践有更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试图从这种比较中揭示大学繁荣的原因，以供借鉴。

为了回答蔡元培与郭秉文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到底有哪些异同，为什么会有这些异同，这些异同说明了什么，对当下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有什么意义等问题，笔者在第一章导论部分为研究的开展作了必要的解释与铺垫，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可行性，以及研究的对象、方法、意义、目的、框架和相关文献等。

第二章至第八章按照办学的逻辑顺序，全面、系统地归纳、比较了蔡元培、郭秉文在北大、南高（含东大）时的办学思想与实践，即分别从大学的认识及其定位、大学的建设与内部管理、大学的职能活动等方面来研究。其中，大学建设包括无形建设（如学科设置、师资建设等）和有形建设（包括图书仪器、学校建筑等方面）；大学的职能活动主要包括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学术交流等。它们之间关系是：对大学的认识及其定位是其办学活动的思想基础，并指导着其办学活动的方方面面；大学建设与管理是其职能活动的基础和保障，大学职能活动是大学建设与管理的目的与指向，即大学建设与管理是为了让大学更好地开展其职能活动。

第九章为结论部分。首先，在综合分析了两人治校方略的基础上，阐明了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及注意平衡的办学思想。其次，在综合分析了两人办学特点的基础上，阐明了他们的办学实践对我们在办学活动中如何处理革新与守成的启发作用。最后，在提炼两人主要异同点的基础上，阐释了办学思想与实践的差异性或多样性既是学术、文化、教育繁荣的表现也是其繁荣的原因，他们之间的共性较多反映了大学办学的规律，对其进行总结有利于指导中国当下一流大学的建设。

关键词：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办学实践；比较研究；大学校长

Abstract

In the early time of Republic of China, there were the most brilliant university presidents who were Yuan-Pei Cai (president of Peking University) and Ping-Wen Kuo (president of Southeast University). They created the first “Golden Age” in the history of the modern Chinese universities, bringing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o her first brilliant moment. This research mainly uses the historical method and comparison research method to study up on th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Yuan-Pei Cai and Ping-Wen Kuo, basing on primary data about them. From the comparisons, we can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n th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Yuan-Pei Cai and Ping-Wen Kuo. Moreover, we can draw lessons from this research because it tries to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flourishing of university from the comparative study.

Where and why are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n earth between Yuan-Pei Cai and Ping-Wen Kuo about their educ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What do they mean? What enlightenment can we get from them to improve the whole strength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make them the world's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first chapter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which paves the way for this research, explaining the background, feasibility, meaning and purpose, the object, methods, important concept, relev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Chapters 2 to 9 is the focus of this research, which gives a detailed comparative study comprehensively and systematically on th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Yuan-Pei Cai and Ping-Wen Kuo from the university outlook, the positioning of school, the subject set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schoo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students training, academic research, soci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s, primary school policies and achievement, etc. It also finds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hen gives the reasons. At last, it proposes their enlightenment to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now.

The final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First, it further summariz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ducation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Yuan-Pei Cai and Ping-Wen Kuo.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difference or diversity could account for and embodies the academ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prosperity in the early time of Republic of China. Thirdly,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are more reflects the law of higher education, thus, they have great implication to the Chines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Key Words: Yuan-Pei Cai, Ping-Wen Kuo, Education Thoughts, Education Practice, Comparative Study, President.

序 言

20 世纪的民国充满战乱、灾祸、外敌入侵与政权更迭，同时新旧思想碰撞、中西学术融汇、大师辈出。据统计，到 2011 年为止，8 位华裔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除了朱棣文和钱永健接受的是纯美国教育外，其余有 6 位（李政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崔琦、高锟）青少年时期接受的都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为什么历经沧桑且仅存数十年的民国，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为人类文明和中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巨匠？而新中国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中，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2005 年）

民国之人之所以群星争耀、大师辈出，首先要归功于它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民国大学的办学经验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和传承的宝贵财富。如何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不同的学者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与视角。王悦芳博士选取了大学校长的角度。这样既可以研究大学与外部社会的关系，又可以探讨学校内部具体的活动，能够比较全面而具体地反映民国大学的办学情况。然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单个大学校长办学思想与实践的描述与研究，而是进一步选取了两位最具代表性的大学校长蔡元培、郭秉文做对比。蔡元培于 1917 年至 192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郭秉文于 1915 年至 1925 年主持南高一东大。他们一北一南引领着中国高教界的发展。

蔡元培在北大的办学成就常为人们所称道。事实上，五四运动前后，郭秉文主持的南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简称）无论在学科设置、体制创新还是在人才培养上都堪与北大相比，于是便有“北大南高”并称之说。虽然南高后来更名为国立东南大学，但人们还是习惯用“南高派”来指代南京高师这一脉。这样一来，中国学界与教育界便有了“北大派”与“南高派”的南北之争。

蔡元培以德国柏林大学为榜样改组北大，在学科建设上，强调“学”、“术”分治，大学仅设文、理、法三科，只做纯理论的学术研究，应用性的“术”科交由高等专科学校来办理。在师资延聘上，蔡元培首重文科，希望把新文化、新思想、新学说引入北大，以革新人们的精神，谋求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在学校管理上，蔡元培仿效德国大学，推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学校的一切事宜都由教授们说了算。在大学的职能上，蔡元培认为大学纯粹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是神圣的、超然于世俗之上的“象牙塔”，不应沾染世俗污秽、名利。大学要以研究学问为主要活动，教学服从、服务于学术研究，服务于社会的活动要放在课业之余，以不影响研究学问为原则。在中西文化交流上，蔡元培主张拿来主义，即大学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应尽量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表面上看对所有思想文化都不偏不倚，实质上是鼓励新派人物在封建主义的文化堡垒里争夺地盘，从而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开辟道路。因此，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凸显出“倡新”、“激进”的办学特色。

郭秉文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博士。他在主持南高一东大校政时，主要借鉴美国大学的办学模式。在学科建设上，郭秉文强调应社会需要设科，“学”、“术”并重，以收相促相辅之效。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高迅速突破了师范的框架，发展成为学科最为

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东南大学。郭秉文遍邀文、理、农、工、商、教育等各科人才，一时间，南高一东大群贤毕至，声名鹊起。在学校管理上，郭秉文借鉴美国大学的经验，实行董事会治校，广泛吸收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力求学校的重大决策都能契合社会的需要。在大学的职能上，郭秉文认为大学应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以及学生将来生活的需要，遂将“学术”与“事功”结合起来，推行教学、研究、推广或实验“三结合”的办学模式，将社会服务纳入学校的日常活动中，大学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大学服务社会，社会支持大学。在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上，郭秉文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针，既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又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文化活动，扩大国际影响，从而把中国教育推向世界，融入整个国际潮流。在办学方针上，郭秉文坚持“平衡”原则，力求有得无失，稳中求进。他既强调学理又重视应用，既强调“新知”又重视“旧学”，既强调科学又重视人文，既强调适应国情又重视放眼世界。与北大相比，南高一东大略显“保守”、“沉稳”。

某种意义上，蔡元培、郭秉文办学上的差异不仅仅是两所大学而更是两个城市（北京与南京）、两个区域（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甚至是两个学派（“北大派”与“南高派”）、两种模式（德国模式与美国模式）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分野。

虽然蔡元培、郭秉文办学思想与实践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努力为培养杰出人才创造条件。杰出人才的成长需要哪些条件？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是天才人物对学问的真兴趣，二是充分的思想自由，三是充分的闲暇（时间之保障），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阅读本书就可以具体了解蔡元培、郭秉文如何通过各自的言行招贤纳士，鼓励他们悉心于学问，同时捍卫大学里的思想自由，为师生们钻研学问提供物质条件和时间保障。可以说，作者以具体历史事实回答了“钱学森之问”。

除了选题上的典型性与现时性之外，该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可读性很强——既没有深奥难懂的理论，也没有生僻怪诞的词句；既没有预设结论，也没有做纯粹的理论推演，仅仅循着历史的足迹与逻辑的顺序娓娓道来，夹叙夹议。“叙”是主体，力求让事实来说话；“议”是点评，意在启发读者思考。闲暇之时，大家不妨翻一翻这本书，相信“开卷”必会“有益”。

是为序。

全国高校校史研究会副会长 王运来

2012年10月14日

目 录

摘 要	1
序 言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大学观与办学目标	11
第一节 德国古典大学观和美国现代大学观	11
第二节 蔡元培、郭秉文的大学观	21
第三节 蔡元培、郭秉文的办学目标	25
第三章 学科组合与师资延聘	29
第一节 学科组合	29
第二节 师资延聘	43
第四章 “设备”建设与学校管理	65
第一节 “设备”建设	65
第二节 经费筹集	69
第三节 外部管理	73
第四节 校内管理	97
第五章 改革旧制 培育英才（一）	106
第一节 南北一致行动：首开“女禁”	106
第二节 人才培养的目标及定位	113
第三节 实行选科制	121
第六章 改革旧制 培育英才（二）	126
第一节 蔡元培：“四育”并举	126
第二节 郭秉文：“三育”齐行	141
第三节 比较与分析	148
第七章 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	153
第一节 蔡元培：“唯纯学理研究是重”	153

第二节 郭秉文：“学”、“术”并重，教、研、用结合	159
第三节 蔡元培：课业之余的平民教育	163
第四节 郭秉文：教育之关系社会生活	167
第八章 沟通中西 放眼世界	173
第一节 蔡元培：强调“引进来”、“学习”	173
第二节 郭秉文：“引进来”、“走出去”并重	176
第九章 总结与镜鉴	181
第一节 办学方针：和而不同，持之有道	181
第二节 办学特点：异彩纷呈，相得益彰	192
第三节 百花齐放：大学繁荣的条件	199
主要参考文献	207
附录一：蔡元培研究与郭秉文研究之比较	208
附录二：郭秉文大事年表	216
后 记	218

第一章 导 论

一、选题背景及源起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拜访年过百岁的陈翰笙先生,想请他说一句祝贺的话。一番沉默后,陈老郑重地说:“我希望北大办得跟从前一样好!”接着又说道:“我希望北大的教授,第一不要兼官,第二要有著作,第三要关心学生,第四要学生提高外语水平。”^①陈翰笙老人所说的“四个希望”其实早在蔡元培校长期间就已经做到了。

不独陈翰笙一人怀念民国时期的大学,许多教授、学者都有“民国情结”。民国大学为何赢得了如此称赞与推崇?带着这一疑问,笔者开始研究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多灾多难的民国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是一个群星争耀、大师辈出的璀璨时期,这当然要归功于民国的教育,特别是其高等教育。而对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奠基性作用的教育家,笔者认为非蔡元培、郭秉文莫属。

蔡元培于1917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校长,郭秉文于1915年至1925年主持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中国第二所国立综合性大学)。蔡元培着力引进德国古典大学模式,而郭秉文注重倡导美国现代大学模式,他们一南一北,共同铸就了民初高等教育的辉煌。

在蔡元培、郭秉文的努力下,中国国立大学第一次在办学实践上全面而系统地学习西方。蔡元培为中国大学注入了德国元素,郭秉文为中国大学注入了美国元素。他们不同的办学旨趣虽然在当时就已经为学者们所注意,但至今都没有系统地归纳与分析。本书在探寻二人办学思想与实践差异的同时,还总结了其共同点,以便揭示深层次的教育规律。

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研究的可行性最基本的含义就是研究能不能做,以及能否做得起来。“能不能做”取决于研究自身的科学性,即所研究的问题是不是一个真问题。“能否做得起来”主要取决于研究者的状况、已有的研究资料及其相应的外在环境的支持。

周正刚认为,真问题是指确实存在的、恰当的、有意义的问题,对这类问题进行探索,可增加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相反,假问题是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的,因而也是不恰当和没有意义的问题。可见,假问题是把子虚乌有的东西作为认识的对象,因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事物的状况,反而造成许多的“误解”和混乱。^②陈向明则从意义阐释的角度指出,真问题起码有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对所选择的问题确实不了解,希望通过研究对其进行认真的探讨;二是该问题所涉及的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并具有实际意义,也是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可见,“真问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真实存在。郭秉文与蔡元培在办学思想与实践上差异,在当时就为人们所注意,如蔡元培认为:大学为“学”不为“术”,郭秉文却强调大学应

① 孙小礼:《我的姨夫陈翰笙》,《传记文学》,2004年第3期。

② 周正刚:《认识结果论》,《求索》,1995年第2期。

“学”、“术”结合。②确实待解决,即人们对此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楚而全面的认识,要么一无所知,要么一知半解。当下,人们对郭秉文与蔡元培在办学思想与实践上的异同,也仅仅有些感性认识,至于到底有哪些异同,为什么会具有这些异同,这些异同说明了什么,则还有待于进一步认真而系统地研究。③有意义,即不做无病之呻吟。本研究能够使人们全面了解蔡元培与郭秉文不同的办学宗旨,正确认识他们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加深人们对民国高等教育的理解,并能以史鉴今,在实践上推动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在理论上推动人们对大学校长的研究。

作者拥有良好的主客观条件:首先,作者对该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完成,并有信心做好这项研究;其次,南京有较好的科研环境,能够比较充分而便利地获得相关的数据和资料,能够得到该研究领域权威人士(如编著过《南京大学百年史》的龚放教授,我国第一本关于郭秉文的专著即《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作者冒荣教授,民国高等教育史专家王运来教授等)的指导。

三、研究的意义和目的

(一) 研究的意义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面镜子,凭此我们可以反观今天的社会,知晓当下的利害得失;历史是一本教科书,正以前人的经历向人们诉说着已有的经验、教训;历史是现实的基础,任何试图脱离历史实际的幻想,最终都将像阳光下的肥皂泡一样破灭。对蔡元培、郭秉文办学历史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过去和现在的高等教育。

1. 加深人们对民国初期中国高等教育的理解

大学的德国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如何系统地引入并全面付诸实践的,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本研究通过郭秉文与蔡元培办学思想和实践的比较——一个非常具体的视角,以小见大地间接回答了上述问题,从而避免了那种脱离实际、仅从理论上泛泛而谈的做法,实事求是地介绍这两种模式在引进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如何克服的,有哪些成败得失?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有哪些作用和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反思和比较,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民国高等教育在复杂历史中的抉择与发展,从而加深人们对它的理解。

2. 正确认识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郭秉文是中国第一位教育学博士,^①不仅亲手创建了东南大学,还开创了该校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被后人尊称为“东南大学之父”。郭秉文还是把美国大学模式全面而系统地引入中国并付诸办学实践的“第一人”。此外,郭秉文曾连任三届世界教育会议副会长,使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舞台上声名鹊起。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昔日的荣耀却被长期尘封,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

蔡元培无疑是中国学界、高等教育界的领军人物,拥有崇高的声望。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使蔡元培家喻户晓。本研究将久负盛名的蔡元培与尘封已久的郭秉文作比较,再现当时的历史,从而帮助世人更为清晰地认识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地位。

① 冒荣:《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3. 以史鉴今：为当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提供借鉴

章开沅在《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总序中提到：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①事实上，当下与未来都是历史的延续，只有研究过去的错误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绝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②

首先，教育史中包含着教育的基本规律。章开沅指出：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③

其次，历史不仅蕴含着教育的基本规律，并且为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④

（我们）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⑤

20 世纪初期，北大校长蔡元培与东大校长郭秉文一南一北，共同拉开了中国大学快速发展、赶超世界水平的序幕，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成就了民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辉煌。本研究通过比较两人在北大、南高（含东大）担任校长时的办学思想与实践这样一个微观的角度，来寻求民国大学繁荣的原因，并希望对今天一流大学的建设有所帮助。

4. 推动对教育家或大学校长的研究

目前，我国对教育家（包括大学校长）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类：个体研究、群体研究、比较研究。个体研究是对某一个教育家的专门研究，其成果虽有具体、生动等特点，并可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但也容易使研究者、读者的所思所想仅囿于某一个教育家的圈子。因此，这种把教育家从社会和他人的联系中硬生生地剥离出来的个体研究，容易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视野和肤浅认识。另外，随着对该教育家的了解，研究者往往生出一种“偏爱”来，其评价很难做到公正、客观。

群体研究是对某一类、某一时段或地域甚至是对所有的教育家们进行的整体性研究。群体研究的成果往往带有抽象、概括等特点，但由于缺乏对比和相应的参照物，这种抽象的概括往往流于空泛，所得的结论常常有失偏颇。事实上，群体研究是把群体当个体，因而个体研究所具有的缺陷，几乎都能够在群体研究中找到相应的影子。

比较研究似乎能够部分地避免个体研究和群体研究的缺陷。无论是个体比较，还是群体比

① 王运来：《诚真勤仁 光裕金陵——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 年版，“总序”第 3 页。

② 同①，第 1 页。

③ 同①，第 3 页。

④ 同①，第 1 页。

⑤ 同①，第 1 页。

较,都不会让人们的眼光仅仅聚焦于一点,在研究范式上摒弃那种单向度的思维,从而较好地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克服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弊端。事实上,许多思想的火花和伟大的创新,往往是在两种或多种思想的碰撞中产生的。

(二) 研究目的及创新之处

所谓研究目的,就是研究者 of 研究所设定的,并试图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所要达到的那种理想的结果、目标或状态。作为一种“未来的可能状态”,研究目的是一座“灯塔”,引领着当下的研究一步步向它靠近,间接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

目的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直接目的与间接目的。本研究的直接目的就是寻求蔡元培与郭秉文的办学思想与实践的异同,分析其原因,并探寻这些异同对当下大学办学的意义;本研究的间接目的就是研究者“希望”自己的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大体相当于研究意义(具体内容见前面)。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是:在对蔡元培、郭秉文大量的一手资料(包括他们的著作及相关的校史资料)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他们在北大、南高(含东大)时的办学定位、学科设置、师资建设、学校管理、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学术交流、办学方略、办学特点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并给予较为中肯的比较、分析与评价,比较详尽地回答了两人在办学思想与实践上到底有哪些异同,为什么会具有这些异同,这些异同说明了什么,对当下我国一流大学的建设有什么意义等问题。

四、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 研究对象及概念界定

蔡元培是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他在中国教育文化界奋斗了一生,既主持过私塾、中小学堂,又主持过大学堂甚至是全国教育,有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经验。以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作为对象的研究不胜枚举。虽然郭秉文直接从事教育实践活动的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主要集中在1915年至1925年,然而其教育思想及经验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本研究选取蔡元培校长北大时(1917年至1927年)与郭秉文主持“南高”、“东大”时(1915年至1925年)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仔细探究,全面比较,以彰显其各自的办学特色和共同秉持的教育理念。

办学思想——按照《汉语字典》的解释,“办学”有两种意思:一是创设或建立学校;二是处理学校事务即经营学校,使之获得发展。办学思想就是人们对“如何创设学校”或“如何经营学校,使之获得发展”的认识。与“办学思想”相对应的词是“办学实践”或“办学行为”。虽然办学思想有两层含义,但是人们在通常的使用过程中,并不严格区分,因为在实践中无论是创设学校还是经营学校,都需要解决一系列的共同问题,如办学方向、指导思想、办学原则、办学目标和办学途径等。因此,办学思想在其通常意义上就是指人们在一定的社会条件的影响下所形成的对办学方向、办学原则、办学目标和办学途径等的系统认识。

办学思想与教育思想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教育思想简单说就是人们对教育的认识或看法。办学思想是教育思想的下位概念,包含于教育思想之中;但办学思想只特指与“学校”发展有关的教育思想。例如,某一院系试图将SCI(科学引文索引)引入科研评价体系时,该想法仅仅是一种与院系发展相关的教育思想。如果人们进一步将该想法推广于整个学校,即作为促进学校发展战略之一,那么它就又属于“办学思想”的范畴了。

一般情况下,办学思想具有系统性。因为“办学”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办学思想也往往自成体系,具有系统化的特征。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对“办学”零散的、琐碎的认识或看法就不是办学思想了,而是说凡以办学成就而著称的教育家往往都有着一整套的办学思想。

(二) 研究方法

1. 比较研究法

比较是认识事物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教育研究中的比较研究法就是在教育领域中,根据一定的标准,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有联系的人或事物进行考察,寻找其异同,进而探求教育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的方法。比较研究法追求“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既要发现表面上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又要探寻表面上似乎有明显差别的事物在本质上有什么相同或相似之处。

同一和差异是在各种事物之间普遍存在的客观联系,这种同一与差异是比较研究的基础。然而,不是任何人和事物在任何时候都能进行比较。实际上,比较研究法有一定的适用条件:

双(多)边性,指被比较的对象必须要在两个以上,因为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事物之间比较才可能发生。另外,比较研究还要求从不同的角度对被比较的对象进行分析比较,仅仅从一个角度对事物作比较,往往被认为是肤浅而片面的。本研究将从大学理念、学科设置、师资聘任、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学术交流、学校建设与管理、办学方针、办学成就等方面,对蔡元培、郭秉文在北大、南高(含东大)的办学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的、多角度的比较研究。

同一性,指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同一范畴、同一类事物,否则就不可以比较。同一性是比较的基础,那些不具有同一性、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是不能做比较的。蔡元培、郭秉文同为民国初期国立综合性大学的校长,且两者主持校政重叠的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因而,对其办学思想与实践作比较,符合比较研究法所要求的同一性。

可比性,指被比较的对象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具有某些本质上而不是表面上的共性。可比性不仅要求事物要属于同一类,具有同一性,而且进一步强调比较对象之间要有本质上的共性,这种共性越多,可比性就越强。蔡元培虽然长郭秉文12岁,但两人执掌大学校政的时间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时间跨度也都达10年之久,主持的学校也都是中国最有影响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他们虽然一个是清末翰林,一个是西洋博士,但都深谙中外教育,皆可谓学贯中西,精通“旧学”、“新知”,其办学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很强的可比性。

比较研究法对本研究有三大意义。首先,比较研究法有利于提升人们对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认识。本研究把不太为人所知的郭秉文与人们耳熟能详的教育家蔡元培放在一起做比较,的确是一个能让人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就正确认识郭秉文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简便而有效的方法。

其次,比较研究法也能使人们体会到多样性与差异性不仅是民初高等教育繁荣的表现,也是其繁荣的原因。若把当下的高等教育状况与民国初年的作比较,就会发现目前的高等教育在多样性、差异性做得很不够,远不如民国时期,因而仍需要进一步的改革和努力。

再次,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郭秉文、蔡元培作为民国初年最为著名的教育大家,对如何办好大学和高等教育有许多真知灼见,因而,其办学思想与实践中的“共性”,无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大学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

2. 历史研究法

历史的范围十分广泛,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称之为历史。历史研究法就是通过对已存在的资料进行研究,寻找事实,在对过去的事物作出描述、分析、说明和解读的同时,又试图寻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解释和指导当前与未来的发展。

历史研究法具体要求有两个:一是要以历史的、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待教育事件、现象和人物,既不可固定化、脸谱化,又不可以今讽古、求全责备。现实是历史的积淀,蔡元培、郭秉文的办学思想在今天看来大多是理所当然,算不得前卫与新奇,但这也正是他们办学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虽历经近百年仍不落伍。笔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中真理终会以它自身的生命力穿过层层的历史迷雾,投射到当下或未来,最终化为人们的常识。

二是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研究教育,即以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研究的基础,把教育放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来研究。既强调教育本身的发展规律,又要探究对教育发展产生作用的各种因素,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自然环境、民族传统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单纯的逻辑上的推理往往使结论过于理想化,只有结合当时历史情况的分析才能使这种“飘在天上的研究”重新扎根于大地,实实在在地解释人们的思想与实践。例如,蔡元培、郭秉文都坚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但由于各自的经历、对时局的看法不同,以及北大与南高面临着不同的实际情况,因而两人在具体的办学活动上有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些“不同”,我们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进行具体分析,既要看到表面上的差异,又要看到本质上的一致。

五、关于文献资料

关于蔡元培的研究资料如下:

蔡元培本人著述。1984年,由高平叔主持的7卷本的《蔡元培全集》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90年代,在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的主持下,多达18卷本的《蔡元培全集》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丛书是迄今为止收录蔡元培著述最全的著作。人们又进一步整理出关于蔡元培某一方面的文献汇编,如高平叔编的《蔡元培年谱长编》、沈善洪编的《蔡元培选集》等。

后人对蔡元培的回忆、纪念及其传记。从纪念蔡元培逝世40周年开始,中国每十周年都有相应的纪念材料出来。有的学者根据这些纪念材料,为蔡元培作传。如张晓唯的《蔡元培评传》、崔志海的《蔡元培》、赵庆元的《蔡元培传》等。

有许多校史资料可以参考。如《北京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校刊》以及为纪念北大百年校庆由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等,从中可见蔡元培在北大时的办学活动。

对蔡元培某一领域中的思想的研究。主要有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伦理学思想、民主革命思想以及教育思想等。还有学者把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育领域的研究中去,进一步推动了蔡元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如梁柱的《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金林祥的《思想自由 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王玉生的《蔡元培大学教育思想论纲》,陈洪捷的《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等。

关于郭秉文的研究和记述主要有四种文献资料:一是郭秉文本人的著述,包括图书、文章、通信、讲演、公文等;二是后人对他的回忆、记述甚至是传记,这类作品主要集中在中国台湾地区;三是校史资料中关于南高、东大的部分,主要反映了郭秉文当时的办学活动;四是后人在前三者基础上对郭秉文的研究成果(见表1-1、表1-2)。

表 1-1 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蔡元培和郭秉文的文章数目 (检索项: 题名)

项 目	蔡元培	郭秉文	备 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1 241	15	检索项: 题名 检索词: 蔡元培、郭秉文 时间跨度: 1911 年到 2009 年 匹配: 精确 查询时间: 2009 年 8 月 14 日 11: 10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世纪期刊	253	0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3	0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40	2	
总 计	1 537	17	

表 1-2 中国知网收录的关于蔡元培和郭秉文的文章数目 (检索项: 主题)

项 目	蔡元培	郭秉文	备 注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5 580	69	检索项: 主题 检索词: 蔡元培、郭秉文 时间跨度: 1911 年到 2009 年 匹配: 精确 查询时间: 2009 年 8 月 14 日 11: 25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_世纪期刊	1 051	3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32	0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38	7	
总 计	7 101	79	

关于郭秉文的著述,可分为教育和非教育两个方面。周谷平、朱绍英对其教育方面的著作做过粗略的统计,^①但不全面,而且有纰漏。笔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郭秉文的教育著作列一个表出来(见表 1-3),供大家参考。

表 1-3 郭秉文教育著作一览表

论著名称	来 源
《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民国十一年之高等教育》	单行本, 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3 年;《新教育》1923 年第 2 期
《中国近年教育之进步》	单行本, 中华教育改进社, 1923 年
《学校管理法》	《教育丛书》第二集第六编, 商务印书馆, 1916 年
《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	载于《最近之五十年》,《申报》编, 1923 年版
《中国现今教育问题之一》	《东方杂志》, 1915 年第 1 号
《郭秉文先生演讲德美设施职业教育之方法》	《教育与职业》, 1917 年第 2 期
《记欧美教育家谈话》	《新教育》, 1919 年第 1 期、第 2 期
《郭秉文报告: 调查战后欧美教育状况》	《教育与职业》, 1919 年第 15 期
《欧美教育新资料》	《新教育》, 1919 年第 2 期
《欧美教育新资料》	《新教育》, 1919 年第 3 期
《郭博士报告: 战后欧美教育》	《教育公报》, 1919 年第 11 期
《美国全国道德教育会宣言》	《新教育》, 1919 年第 4 期

① 周谷平, 朱绍英:《郭秉文与近代美国大学模式的导入》,《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续表

论著名称	来 源
《战后欧美教育近况》	《新教育》，1919年第4期
《十年之高等教育》	《新教育》，1921年第2期
《十年之教育调查》	《新教育》，1921年第3期
《对于孟禄中国教育讨论之感想》	《新教育》，1922年第4期
《费城博览会中国展览第三次报告》	《新教育评论》，1927年第9期
《刘伯明先生事略》	《学衡》，1924年第26期
《我国教育行政之缺点》	《申报》，1915年8月31日第6版
《太平洋各国大学如何最能增进国家了解与友谊》	《教育与人生》，1923年第5期；《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湾中华学术院，1971年，英文部分第1页
《爱丁堡世界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湾中华学术院，1971年版，第13页
《郭秉文先生与“南高”“东大”》	朱耀祖整理，《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湾中华学术院，1971年版，第62页；曾发表在《中国一周》上
《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湾中华学术院，1971年版，英文部分第176页
《孟芳图书馆记》	《孟芳图书馆落成纪念册》，1924年

除此之外，郭秉文在“南高”、“东大”时的讲话、公文、公函以及与同事之间的来往信件，也能体现他的教育思想。这些资料一是收在校史资料、纪念册、同事的选集或全集之中；二是见于郭秉文本人资料的收集。据吴俊升回忆：“唯所遗书函文件数箱，经整理，其生平事迹，当可见全貌。”^①

郭秉文还有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著述。要全面了解郭秉文的教育思想，必须注意收集和研究这些非教育方面的资料。“全集”是研究历史人物的基础，笔者衷心希望“郭秉文研究会”早日成立，并主编一套《郭秉文全集》出来。

关于郭秉文同事或学生的回忆、记述及其传记，主要有中国台湾中华学术院于1971年印行的《郭秉文先生纪念集》。王成圣、宋晞写的《郭秉文传》，收录于1986年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国人物传》中。2005年，中华书局朱信泉编著的《民国人物传》，亦有郭秉文的相关传记。

相关的校史资料。如朱斐主编的《东南大学史》，王德滋主编的《南京大学史（1902—1992）》、《南京大学百年史》，龚放、冒荣编著的《南京大学》，黄细良编著的《走向辉煌——今日南京大学》，《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出版的《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校史资料编辑组编印的《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台湾大学编印的《中大八十年》等。

至于后人对郭秉文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根据CNKI的统计，在2000年之前这类文章很少，即使有也多是散见于“东南大学”、“高校火灾”、“庚款留美”等研究。2000年初，王运来先生发表了《略论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一文。此后，研究郭秉文的文章日渐增多。2004年，冒荣先生名为《至平至善 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的专著出版。该书是

① 吴俊升：《业师郭鸿声先生教泽追思录》，《郭秉文先生纪念集》，台北，中华学术院，1971年，第8页。